



在民族危难之际，抗战诗歌运动非常活跃。烽火与硝烟中的诗歌刊物是凝聚全国诗歌作者的纽带，它们以晶莹的光与热照亮历史的时空，为繁荣抗战诗歌作出积极贡献。创办于四川成都的一本刊物《诗星》，就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诗为战斗的武器，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歌，为血与火的时代呼喊。

为抗战大时代呼喊

《诗星》的主编牧丁是一位执着于诗歌创作的青年诗人，原名顾祝漪，江苏省涟水县人，1935年开始发表诗作。1939年1月，在陕南安康中学就读的牧丁，听说诗人李广田在国立六中任教，赴四川梓潼转入该校师范部。在校期间，他与贺敬之等同学办诗壁报，练习写作。他们将诗作投寄成都的《华西日报》《飞报》和全国文协成都分会办的《笔阵》等刊物发表。他的诗作受到作家萧军的赞许和鼓励，萧军还告诉他，书并不一定要在学校读，社会中学到处都可以学习，他由此产生了为抗战大时代呼喊的想法，想到成都开创一个自己的阵地。在贺敬之等同学的促动下，得到萧军来信同意后，牧丁赴成都借萧军主编的《新民报·新民座谈》副刊版面，创办了《海星诗页》周刊。1940年2月2日，《海星诗页》刊出第1期，至4月第9期时，因成都发生“抢米案”，《新民报》被迫停刊，《海星诗页》也到此终刊。

1940年4月下旬，牧丁与几个诗友凑钱，于7月20日出版了一个32开仅8页的小型诗刊《诗星》。创刊后得到婴子、张天授、考蒂克、李岳南等人的声援，还得到了郭沫若的鼓励，不仅寄来诗稿，还为刊头和诗刊的出版方“海星诗社”题名。《诗星》到1941年8月终刊，共出版25期，诗稿来自江苏、陕西、山西、重庆、成都等全国各地，作者团队有80余人，可见其影响广泛。《诗星》由海星诗社全体社员负责，但在成都的仅有主编者牧丁。诗刊起初由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经销，外埠由社友代售，每期售完再出下期。后与成都的莽原出版社签订合同，由他们出资，第二集四、五期合刊，篇幅已到60页，海星诗社还出了两套丛书，分别是《海星诗丛》和《诗长征丛书》，前者包括魏荒弩译的长诗《爱底高歌》、雷石榆《在战斗中歌唱》、蒂克《小兰花》、李岳南《哀河北》、彭桂萼《边塞的军笳》、覃子豪《自由的旗》、婴子《季候风》等；后者包括影痕《杀人交响曲》《五月的农村》《水车》《街头》，列入筹印中的还有张天授《北平和北平的人们》、艾漠《我们的行列》、夏天《马与枪》、王亚平《红蔷薇》等7本。海星诗社为保存抗战时期的诗歌文本、促进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下半年，在牧丁支持下，由学生周鼎文集资创办莽原出版社，牧丁任顾问，接洽发行

成都文协会刊《笔阵》和《诗星》。后成立《文艺纵队》编辑部，由碧野主编《莽原》。由牧丁和张天授具体负责编辑“莽原文丛”，包括《文艺新论》（郭沫若等著）、《大路之歌》（美国惠特曼著，高寒译）、《耕耘集》（王亚平著）、《母地》（李蕙译）、《老处女》（丰村著）、《黑货》（徐盈著）等作品。同时，还编选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抗战时期的文章，印行《莽原活叶文选》，供给各中学教学用。海星诗社还积极参与成都文化界的各种社会活动，通过叶菲洛与“文协”成都分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对促进四川抗战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对祖国炽热的爱化作滚烫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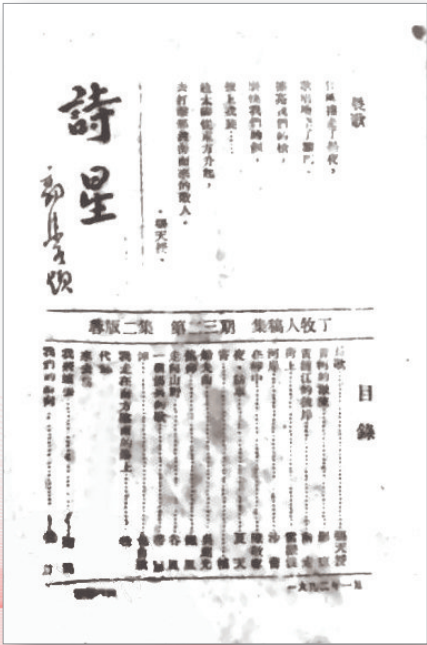
牧丁称《诗星》是“只有菜籽粒大的小小刊物”，但它的作品不是象牙塔里的个人哀愁，而是直面现实，为抗战而歌，赞美劳动与创造，抨击战争与丑恶。《诗星》创刊号第一期刊登了牧丁的《诗人》：“诗人，骑匹苦难的/马，握一把睿智正义的/剑，锋利得无情/可以削断了风，跑在所有的/前面，但自己是带了一身的伤……”这当是牧丁的诗宣言，也是办刊的诗学理论。诗人当是时代披荆斩棘的先锋，勇于担当起时代的重任。《诗星》刊载的作品多为抗战题材，如艾漠《工作还没有完》、影痕《无名英雄的墓碑》、姚散生《灯》等。姚散生的《灯》写得明快、简洁，如一幅生动的素描：“从菜油里迸射着光芒/于是，阴暗的角落有了明亮/不要说太渺小了/渺小中也有充实的生命——/当人间夜幕尚未卷起/请珍惜这篝火似的微明/黑夜的僻巷/窗上上透出淡黄的灯光/几双纤纤女子手/替战士赶制御寒的衣裳。”诗后注明作者善于大轰炸后，表达作者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牧丁向往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怀念奔赴敌后与敌人战斗的诗友，他从现实生活中撷取诗情和灵感，把对祖国炽热的爱化作滚烫的诗句。1940年9月15日，成都召开大会悼念为国殉职的张自忠将军，他一挥而就长诗《你没有死，活在千百万英雄的心里——悼张自忠将军》，赞美张自忠将军是“从天外飞来的一头猛鹰”，是“哀兵的首领”，是“戴着铁板，高歌东去的大汉”。诗作感情真挚，沉郁顿挫，壮怀激烈。他怀着对祖国强烈的爱，抨击现实的腐败和黑暗，《太阳出来了》一诗写出了他当时的心境和意象，弥漫着忧郁和感伤，反映了作者困守大后方的苦闷、孤寂。诗作以多雨阴湿的天气象征大后方的政治生态，通过太阳寄寓自己对光明的向往，写出了诗人在流浪中感受着人类的苦难，同时也写出了诗人“以苦涩的脚跟着远行的草径”寻找温暖、寻找光明的倔强。在《我走在南方阴雨的路上》《小雨》等诗篇中，诗人对人类苦难的体认更明确、更深刻。

“用感情的线，联系着民族斗士底心，传播着抗战底声”——记抗战时期的西南诗刊《诗星》及诗人牧丁

□王双华

在主编牧丁和海星诗社成员的努力下，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诗刊《诗星》，刊发全国各地诗歌作者的抗战诗作，积极参与成都文化界的各种社会活动，肩负起孵化诗歌人才、壮大诗歌队伍的责任与使命，对促进大后方抗战新诗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诗星》封面，春版二集，第二、三期，郭沫若题字



《诗星》封面，莽原出版社出版

他试图把孤寂的个人世界和人类之苦，与抗战大时代孕育出来的“大我”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在人类命运的大背景中书写个人感情，体现了宏大的诗学视野和富于时代色彩的艺术抱负。牧丁深受艾青、田间的影响，也赞同胡风的诗学理论，把诗的时代性、民族性和诗人的个性紧密地联系起来。牧丁与七月诗派的作者交往密切，遵循与“七月诗派”相似的诗歌美学办刊，撰稿者贺敬之、牛汉后被列入“七月诗丛”作者群。《诗星》与“七月诗派”的关系也成为研究抗战诗歌的重要课题。

“融入更阔大、更丰富的存在中去”

牧丁说：“我们不认哪个有名哪个无名，只要是写诗的。”“我们都是是一样的。有时我们还崇拜无名，这个时代里，往往伟大的属于无名的。”与《诗星》结缘，从《诗星》起步，经过抗战烽火的洗礼，许多无名诗人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化领域的中坚人物，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文坛上。《诗星》起到了孵化诗歌人才、壮大诗歌队伍的重要作用。

李瑞玉在《牧丁主编“诗星”的历程》（《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中介绍了部分作者的情况，其中艾漠（贺敬之）和谷风（牛汉）为当时最年轻的两个诗友，也是撰稿最多的人。贺敬之于1940年赴延安，因生活流动不定，原稿多寄存牧丁手里。凡《诗星》容纳不了的诗稿，则由牧丁分寄各地。“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曾任《诗刊》主编的广民（严辰）等青年诗人的诗作多是

寄给《诗星》发表，或由牧丁转给婴子主编的《江南文艺》发表。除了青年诗人之外，《诗星》的作者群中也有当时已成名的成熟作家，如“左联”时期的军旅诗人雷震波、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等。《诗星》还刊出征求社友的启事，以征友的方式扩大影响，并把抗战诗歌活动推向深入：“我们伸出真诚的手，预备和成都或他地诗作者结起热烈的友谊……接受不识面朋友的暖意。”叶菲洛、孙则剑、张天授等人都是看到启事后来信加入诗社，还介绍了李岳南、赵慧澄、张秋君等人入社。1940年8月，李岳南从重庆给牧丁来信：“昨天傍晚入城购得《诗星》，从社语中知了你的地址，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希望我们经常取得联系……冯振乾在兰州，他最近打算在那边与几个朋友编一个综合性的刊物，他负责文艺栏，又在报纸上出一个诗刊，希望寄点文友的稿子去。”经李岳南介绍，牧丁与在西北倡导创作“新边塞诗”的冯振乾有了联系，也让海星社的诗人走进大西北。随后，冯振乾介绍了当时在天水国立五中读书的牛汉参加诗社活动，他也逐渐成为诗社的中坚力量。

1941年的西南文坛刊物林立，但坚持下来并不容易。全国文协成都分会的《笔阵》因经费问题一年来只出一期，《挥戈》《祖国文艺》《西部文艺》因各种原因停刊，《散文与诗》只办了一期，《诗星》是当时西南地区坚持得较久的一本诗刊。虽然条件极其艰辛，但为抗战奉献的精神和对诗歌创作的热爱支撑、鼓励着刊物的编辑。因经费

和人力匮乏、印刷条件极差、纸张质量低劣等原因，诗刊经常脱期，读者和朋友不断来函询问。牧丁为刊物的送审、印刷，常常需要步行30多里路。为能继续办刊，他从1941年开始赴远郊的一个中学教书。1942年8月，他应聘到数百里外的彭山县省立女师，离开了成都，从此再无法兼顾《诗星》，海星诗社的活动也随着他的离开而结束。牧丁与刊物《诗星》为大后方的诗歌抗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他在《我们走了——寄烟火社同仁赵一元》中写下的诗行，今天读来仍然滚烫：“我们跟着行进中的队伍，走了……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喉，向路旁，/怀疑我们的/人民，呼喊，呼喊他们来增厚我们的队伍。”

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年代，也是一个纯真而激情的年代。那么多不曾谋面的年轻人因为诗、因为文学、因为抗战而结成挚友，《诗星》竭尽绵薄之力联络全国各地的诗人作者，为抗战呐喊，积极推动抗战诗歌发展。他们“为了祖国的文化，为了祖国的生存”，“用感情的线，联系着民族斗士底心，传播着抗战底声”。牧丁的诗作《人的儿子——写此勉植并自励》是他写给刚出生的儿子的诗，也可看作他人生的宣言，“站起来”只是生命的第一步，如何摆脱受奴役的传统命运，成为真正的“人的儿子”，才是问题的关键。牧丁在诗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融入更阔大、更丰富的存在中去。融入大时代，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争取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获得新生。

（作者系诗人、评论家）

重点推荐

生动诠释抗战精神的淬炼历程

——评《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

□虞茹意

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左玉河的新作《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应时而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要成果，该书以丰富的档案文献为支撑，全面系统梳理了1937年至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史，视野宏阔、论证扎实、分析透彻，深刻揭示了伟大抗战精神在烽火中淬炼升华的历程，有力佐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书中系统呈现的中国共产党抗战思想发展史，为当代思政教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展现出了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深度与时代价值。

《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始终坚持把唯物史观作为理论研究的根本立场，从“时代维度”“实践维度”和“主流维度”三层视域审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路径。从“时代维度”透视，该书精准锚定了贯穿抗战始终的三大时代主题，即“如何取得抗战胜利”“如何在抗战中实现民主”“如何在战后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所有主题的核心底色是“争取民族独立”。正是这样的时代课题，驱动着中国社会各阶级展开激烈且深刻的思想论争，形成了多元思想碰撞的格局。“实践维度”进一步揭示思想与行动的辩证关系。书中细致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思想主张，在华北平原的地道战、铁道游击战中“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思想不断丰富，在根据地治理中，“三三制”政权理念落地生根，最终形成指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实践智慧。“主流维度”更清晰勾勒出抗战时期思想演进的主脉，当“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逐渐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主流，从《论持久战》的



战略预判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推进，这一思想既回应了时代需求，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最终成为引领抗战方向的科学精神旗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淬炼历程与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必然性。

该书生动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中国去向何处”这一时代重大命题，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凭借着坚如磐石的意志与强敌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构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精神特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从一盘散沙到万众一心、从局部抗战到全

民族抗战的根本性蜕变。在这一进程中，伟大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集中凝结与高度升华，彰显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历史研究到精神阐释，该书搭建起连接学术研究与思政教育的桥梁，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与价值指引。特别是书中呈现的中国共产党抗战思想的发展与实践探索，让伟大抗战精神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历史场景，有助于青年群体更直观地理解其核心内涵。

毛泽东《论持久战》对“亡国论”“速胜论”的驳斥，展现了理论清醒与战略智慧对民族抗争的重要意义，能引导青年认识到伟大抗战精神不仅是战场上的勇气，更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力量。敌后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动员与武装民众思想建设等方面的生动史实，能让青年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把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追求，理解伟大抗战精神是无数普通人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行动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为青年理解抗战精神的文化根基提供了新视角。这种从历史到现实的延伸，让青年在历史认知中深化价值认同，在情感共鸣中传承精神内核，实现了历史观教育与价值观引领的有机统一。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这部著作提醒我们，唯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唯物史观，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院助教）

哲贵的中篇小说《微不足道的一切》以细腻笔触讲述了丁小武的家庭生活。诚如书名所示，故事聚焦的皆是生活琐事，看似“微不足道”，可一旦置于家庭语境中，便如串联筋骨的脉络，稍一碰触，便牵一发而动全身。

小说开篇，丁小武便直言自己陷入了难题：父亲丁铁山患上重度老年痴呆，生活无法自理。作为儿子，他本能地想担起照料责任，可现实却让他陷入“两难”。父亲与妻子柯又红早有嫌隙，甚至曾放话“家里有她就没有了丁铁山”。如今父亲急需人照顾，丁小武必须在“尽孝”与“护妻”间做抉择。这个选择，不仅关乎责任义务，更缠绕着夫妻、父子间的复杂情感，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引爆，便会触发家庭关系的连锁反应。作者精准捕捉到这一矛盾焦点，以此为切入点，层层剖析家庭关系的肌理。这一核心矛盾贯穿小说始终，情节推进、叙事节奏、人物语言与心理活动，皆笼罩在它的影响之下。丁小武作为冲突的中心，他始终想做家庭的“调和者”，却在现实拉扯中屡屡被动。一边是病弱需照料的父亲，一边是态度强硬的妻子，他的妥协与纠结几乎写满每一处细节。丁铁山这位昔日利落果决的老人，在疾病侵蚀下，只剩反复呼唤“丁小武”的本能反应。作者并未刻意剖白他的心理，因对失智老人而言，所有逻辑与矛盾，早已被机体本能所压制。

书中最具张力的人物当数柯又红，她的摇摆与转变，甚至直接推动着情节走向：从最初坚决不让丁铁山同住，到中途为挽回婚姻主动退让、同意父亲搬到公爵山庄，再到丁铁山离世时脸上复杂难辨的神情。从执意让丁小武开厂子，到后来主动卖掉厂子，乃至小说结尾，面对丁小武昔日交好的董南妮上门，她的心态也悄然松动。而女儿丁点点，作为家庭冲突的“旁观者”，当矛盾蔓延到自己身上时，她选择以“退婚”保持距离。这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家庭困境的无奈回应。这些矛盾在有限篇幅里交织叠加，却毫无荒诞感，反而如一面镜子，照见无数家庭的日常：每个人都是矛盾的集合体，当亲密关系将彼此拉近，那些隐藏的棱角便会愈发凸显。

故事在矛盾中推进，人物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我找寻”。丁小武曾对“为何照料父亲”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解释：“我是在以这种方式找回父亲，同时也找回自己。”在家庭里，每个人的角色常被简化成“矛”与“盾”：丁小武性情温和，习惯将就妥协，是“防守、求和”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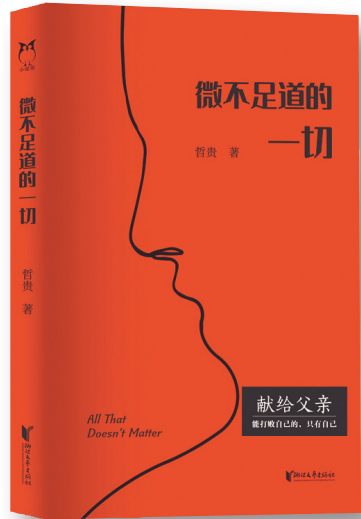
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中感受爱

□李莹

方；柯又红性格泼辣，言语强势，是“进攻、尖锐”的一方。但在照料丁铁山这件事上，两人却走向了性格的“另一面”：丁小武变得执拗决绝，柯又红反倒学会了妥协退让。这种转变，既是对自我性格的探寻，也是家庭情感的“修复过程”。小说还设计了一个极具“回环性”的情节：丁小武后来患上了帕金森病。这一设定不仅为故事增添了戏剧性，更藏着深刻隐喻。人的一生如同抛物线，从起点攀升至顶点，再缓缓落下，最终归于终点，这正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如今，疾病与失智的阴影，从丁铁山转移到了丁小武身上，这个家庭，又将面临一场熟悉又陌生的“疾病风波”。而这一次，柯又红的转变最为彻底：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温柔，那份褪去尖锐后的包容，让我们清晰看到了这个角色的成长与蜕变。

在书的后记里，哲贵谈及对“爱”这一主题的思考，这或许是他希望借这个故事传递给读者的核心议题。情感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个人的生存体认、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以及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刻感悟。丁铁山、丁小武、丁点点祖孙三代的命运交织，勾勒出一个完整生命轨迹。人生中，成长、情感纠葛与疾病磨难本就是无法回避的课题。那么，个体究竟如何重新找回自我？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摩擦与矛盾里。这些日常纠葛好比一根根细小的线头，人的一生是松弛凌乱还是紧实有序，全看我们如何梳理、应对这些“线头”。

（作者系第三期鲁迅文学院残疾人作家研修班学员、第四届全国残疾人文学创作研修班学员）



《微不足道的一切》，哲贵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